

从“双基”到“三维目标”，再到“核心素养”

——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学科教学目标述评

郑 昀，徐林祥

（扬州大学 文学院，扬州 225002）

摘要：语文“双基”重视语文基础知识传授与语文基本技能训练，但也会导致知识灌输、纯技术训练，忽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倾向。语文三维目标的提出，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期望在过程中掌握方法，获取知识，形成能力，培养情感态度价值观，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升，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着忽视三维目标是个整体，将其割裂为并列的三类目标或三项目标，以及过于强调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问题。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出，意味着课程观和教学观的转变：课程即问题、教学即研究，落实了“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适应了教育改革的时代和国际潮流。

关键词：语文课程；双基；三维目标；核心素养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17)10-0043-07

一、关于双基

虽然教育部1953年3月颁发的《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已有使学生“得到现代科学的基础知识和技能”^[1]的表述，但就语文学科而言，明确提出语文“双基”还是在稍后的20世纪60年代初。其背景是1955—1958年的汉语、文学分科，1957年的整风、反右和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受前者影响语文课被上成了文学课，受后者影响语文课被上成了政治课。“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是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一课，全文只有六百七十来字，用四节课讲，大讲政治道理；讲杜甫的《兵车行》一诗，对杜甫的时代与

生平就讲两课时，分析作品用一大套名词术语。”^[2]

1959年6月3日，上海《文汇报》刊发了上海育才中学语文教师刘培坤的文章《“文”与“道”——关于语文教学目的和任务的我见》，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语文教学目的和任务问题”的讨论。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文汇报》又开展了“怎样教好语文课”的讨论。1961年12月3日《文汇报》发表社论《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知识教学和政治教育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实践中教好语文课三方面对这场讨

收稿日期：2017-04-13

作者简介：郑昀，女，山东潍坊人，扬州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徐林祥，男，江苏兴化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扬州大学中国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育史、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论作了总结。社论指出：“语文，归根结蒂是一种工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生产斗争的工具，是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是传播知识的工具，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攀登文化科学高峰的工具，一句话，是人们用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个重要工具。”“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应当是：使学生正确、熟练地掌握与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培养与提高学生的阅读与表达能力，并通过教学内容的教育与感染，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观点，健康的思想感情和高尚的品德。”语文的教学过程“应当先从识字辨句到了解思想内容，再从思想内容进而研究用词造句、篇章结构等表现技巧，通过表现技巧的分析，必然加深对思想内容的理解。如此往复回旋，辩证地发展”。

1961年8月和1963年1月《人民教育》先后发表了刘松涛署名洛寒的文章《反对语文课教成政治课》和《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这两篇文章也反映了语文教育界要求克服忽视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倾向的态度。1963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这两个文件在指出“应该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同时，也指出：“（中学）语文课应该使学生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作文要力求文理通顺，用词确切，正确地使用标点符号，字写得端正，不写错别字。”“教师讲课，必须把课文内容讲解清楚。一般不要把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讲成政治课，也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小学语文课应该使学生认识3500个常用汉字，学会汉语拼音（作为识字的辅助工具），掌握常用的词汇；流利地诵读课文，并且能够背诵教师指定的一部分课文；字写得端正；会写一般的记叙文和应用文，语句通顺，注意不写错别字，会用标点符号。一般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或者政治课。”^{[3]282-284,274}

这一时期，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都公开发表文章，表明了他们对语文教学的基本观点。叶圣陶指出：“我谓课本中明明有政治性文篇，明明有文学作品，宁有避而不谈政治与文学之理？所称‘不要讲成’云云者，勿脱离本文，抽

出其政治之道理而讲之，化为文学理论之概念而讲之耳。……工作条例（引者注：指《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中列入‘不要讲成’云云之语，盖针对教学上之积弊而言。”^[4]1963年4月，吕叔湘在《文字改革》发表《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一文。文章说：“我认为每一个做教学工作的人必须首先认清他教的是什么。从事语文教学就必须认清语言和文字的性质；从事汉语语文教学就必须认清汉语各种形式——普通话和方言、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分别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其次，我认为从事语文教学必须认清人们学会一种语文的过程。”吕叔湘指出：语文教学的内容，“应该语言和文字并举，以语言为门径，以文字为重点，达到语言和文字都提高的目的”；语文教学的过程，主要是学习使用语文的过程，而“语文的使用是一种技能，一种习惯，只有通过正确的模仿和反复的实践才能养成。”1963年10月10日，张志公在《光明日报》发表《说工具》一文。文章指出：“语文是个工具，进行思维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因而是学习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工具，是进行各项工作的工具。”张志公认为：“语文教学的目的主要不在于教给学生有关自然的或者有关社会的知识，因为那是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那些学科的工作；语文教学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教给学生太多的文学理论知识或者文学创作技能，因为中学毕业生需要的是一般的读书、作文能力，就是阅读各种各类的书籍，写各种各类的文章的能力，而不是只要阅读文学书籍、必须创作文学作品的能力；语文教学的主要目的也不在于教给学生很多政治思想的知识或理论修养，因为那是政治课的工作。”“就整个的语文教学来说，还是不能不把教学生掌握语文工具这个目的明确地、突出地提出来。”

与此同时，一些语文教育工作者意识到必须加强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吕型伟署名殷伟在《上海教育》1961年第9期发表《切切实实提高中学语文教学的质量》的文章；沈佩畦在《上海教育》1962年第2期发表《中小学语文课字、词、句、篇教学初探》的文章；吴天石在《江苏教育》1962年第11期发表《加强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训练》的文章；廖慧

予在《江苏师院学报》1962年第6期发表《中学语文的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兼论〈语文教学法〉课程的发展途径》的文章。语文教育界明确提出了“加强‘双基’”的口号，并将“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八个字，称为语文教学的“八字宪法”。

正是吸收了上述成果，1963年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明确规定：“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初步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同时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着重识字、写字和作文训练，要选文质兼美的范文教学生精读，一部分还要背诵。上述训练，要通过多读多练来完成。一般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或者政治课。”同年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规定：“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3]153-154}同时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选文质兼美的范文，教学生精读（一部分要背诵），要加强识字写字、用词造句、布局谋篇等基本训练。基本训练要通过多读多写来完成。一般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也不要将语文课讲成文学课。”^{[3]416}加强“双基”，精讲多练，一时成为语文教师的自觉追求。

遗憾的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双基”，语文学科教学重蹈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的覆辙。至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基础知识教学与基本技能训练才重新得到重视，并在80—90年代有所发展。

1978年3月16日，吕叔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小学语文课所用教学时间在各门课程中历来居首位。新近公布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10年上课总时数是9160课时，语文是2749课时，恰好是30%。10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文章建议：“是不是应该研究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

1978年3月21日，叶圣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召开的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的重要讲话，呼应了吕叔湘的文章，建议“语文教师和语言学科的工作者通力协作研究语文教学，做到尽快地改进语文教学”。^[5]

1983年，钱梦龙在《“三主”“四式”语文导读法探索》一文中，将自己从教四十多年的经验上升为“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的理论概括，进而形成以“三主”为理论基础、以“自读”“教读”“作业”“复读”等课式为“基本式”的“语文导读法”的总体框架。^[6]1988年，钱梦龙在上海《语文学习》杂志第8、9、10期发表《“主体、主导、主线”再探》的系列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的思想。

1984年，魏书生在《研究学生心理 提高语文教学效率》一文中提出“语文知识树”的理论。他说：“我让学生把初中六册教材都找到，分册画出‘语文知识树’，即假定语文知识是一棵树，那么什么是这棵树上的主干、支干和枝叉呢？这样，语文知识的序列在学生的头脑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准确了。最后大家共同把初中语文知识归纳为四部分、十九项、一百一十八个知识点。四部分，即现代汉语、文言文、文学常识、阅读与写作。平时学生感觉阅读和写作最茫然，似乎无序可循。经过整理，归纳为五项、十九个知识点：一、中心（正确、鲜明、集中三点）；二、选材（围绕中心、真实具体、典型、新颖四点）；三、结构（层次和段落、过渡和照应、开头和结尾三点）；四、表达（记叙、说明、议论、描写、抒情五点）；五、语言（准确、简练、鲜明、生动四点）。知识点就是‘知识树’的枝叉，枝叉下面还有小叉：例如‘描写’这个知识点，又可分为两小点，即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而人物描写还可分为肖像、动作、语言、心理活动四个更小点。”^[7]

1992年，教育部颁布《九年义务教育大纲 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该大纲将“课文”“能力训练”“基础知识”“课外活动”一并列入“教学内容”，在“能力训练”之下首次明确提出初中阅读训练、写作训练、听话

训练、说话训练共 48 个能力训练点,在“基础知识”之下列入初中汉语知识(包括语音、标点符号、汉字、词、短语、句子、修辞)、文体知识、文学知识等 20 个知识训练点。1993 年,该大纲的主要执笔者顾黄初、钱梦龙、徐振维、欧阳代娜、张鸿苓、章熊合著《〈九年义务教育大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能力训练指要》,对该大纲提出的 48 个能力训练点逐条解读,以期“读者们能通过这些说明既了解‘能力训练’的基本内容及其要求,也明白《大纲》的主要特点及其精神”。^[8]冯钟芸、刘国正、于漪分别为该书写了序。

与《九年义务教育大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衔接,1996 年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提出了高中阅读、写作、听说等能力训练点 18 个和基础知识点 18 个。该大纲还明确将“语文训练中知识教学和能力训练密切结合”作为语文教学的原则之一。要求知识教学要精要、好懂、有用,着眼于提高语文能力;能力训练要务实、得法、有效,要注意运用语文知识。^{[3]536}

语文“双基”重视语文知识传授与语文技能训练,提高了语文教学的质量,但也可能导致知识灌输、纯技术训练,忽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倾向。

二、关于三维目标

语文“三维目标”于 21 世纪初提出,其背景可追溯至 20 世纪后半期的国际课程改革潮流。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7 年出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拉塞克等著《从现在到 2000 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和《教育的使命——面向 21 世纪的教育宣言和行动纲领》,即反映了这一国际课程改革的动向。

1997 年第 11 期《北京文学》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题,刊登了邹静之的《女儿的作业》、王丽的《中学语文教学手记》、薛毅的《文学教育的悲哀》三篇文章,对语文教育的现状进行了批评,引发了 20 世纪末关于语文教育问题的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双基”再次受到批

判,有人将“语文训练”视为应试教育的产物而大加鞭挞,还有人甚至认为语文教育“误尽苍生”,但这次讨论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有关讨论文章,分别被收入王丽编《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孔庆东、摩罗、余杰主编《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钟晓雨主编《问题与对策: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和江明主编《问题与对策——也谈中国语文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等书中。

1999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发[1999]9 号);2001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1]21 号)。2001 年 6 月,教育部发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教基[2001]17 号)。这是推动我国 21 世纪课程改革的几个重要文件。

2001 年 7 月,教育部颁布了各科全日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与新课标配套的新教材也先后出版。2003 年 3 月 31 日,教育部正式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和高中 15 个学科的课程标准。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是这次课程改革的主导思想。

教育部 2001 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其课程目标根据“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设计。2003 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继续坚持《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的基本理念,根据新时期高中语文教育的任务和学生的需求,从“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出发设计课程目标,努力改革课程的内容、结构和实施机制。

知识和能力关注的是在语文教学中要培养现代公民所应具有的基本的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事实上,这也是一个人语文素养的核心要素。过程和方法关注的是学习主体在言语实践过程中语感和文化的积累、认知能力和学习策略的发展,以奠定其终身学习、终身发展的基础。情感态度价值观关注的是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高尚的人格情操与审美情趣的发展,并在这样的一种人文熏陶中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

态度。

自 2001 年国家启动了 21 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至 2011 年，经过十年的实践探索，课程改革取得显著成效，构建了有中国特色、反映时代精神、体现素质教育理念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各学科课程标准得到中小学教师们的广泛认同。同时，在课程标准执行过程中，也发现一些标准的内容、要求有待调整和完善。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适应新时期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教育部组织专家对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完善。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咨询意见和教育部基

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的审议结果，经研究，决定正式印发义务教育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1 年版），并于 2012 年秋季开始执行。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认定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强调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础；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

比较《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的相关论述，亦可看出后者对语文课程的核心目标——学习祖国语言文字的运用的重视。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 ^[9]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 ^[10]
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语文又是母语教育课程，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而，应该让学生更多地直接接触语文材料，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律。	语文课程是实践性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语文课程是学生学习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课程，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而，应该让学生多读多写，日积月累，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体会、把握运用语文的规律。
语文课程还应考虑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对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和学生思维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在教学中尤其要重视培养良好的语感和整体把握的能力。	语文课程应特别关注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对学生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和思维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在教学中尤其要重视培养良好的语感和整体把握的能力。

语文课程标准颁布与实施，标志着从“双基”到“三维目标”的转变。语文三维目标的提出，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期望在过程中掌握方法，获取知识，形成能力，培养情感态度价值观，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升，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着忽视三维目标是个整体，将其割裂为并列的三类目标或三项目标，以及过于强调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偏重人文性目标的问题。这一现象甚至在实施新一轮课程改革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存在。

以 2016 年 11 月在河南郑州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小学魅力课堂教学大赛暨第四届“名师大课堂”观摩会上两位老师教学设计中的教学目标为例。A 老师《七律·长征》教学目标：“1. 能正确、有感情地朗读诗歌，感受七言律诗的特点；2. 通过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理解诗意，感悟诗情；3. 倡导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英勇豪

迈的气概。”这三条教学目标，显然是分别从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方面设计的，且这三条目标都比较空泛。B 老师《狮子和鹿》教学目标：“1.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理解故事的内容，通过角色转换体验等方式体会寓言故事所蕴含的道理；2. 学习抓住关键词句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尝试运用语气词表达内心情感。”相比之下，该老师则注意到了将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糅合在一起，在达成工具性目标的过程中达成人文性目标。

三、关于核心素养

所谓“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11]它是关于学生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

面要求的结合体；它指向过程，关注学生在其培养过程中的体悟，而非结果导向；同时，核心素养兼具稳定性、开放性与发展性等特性，其生成与提炼是在与时俱进的动态优化过程中完成的，是个体能够适应未来社会、促进终身学习、实现全面发展的基本保障。

1997年12月，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启动了“素养的界定与遴选：理论和概念基础”项目，确定了三个维度九项素养。2002年美国制定了《“21世纪素养”框架》，2007年发布了该框架的更新版本。2004年芬兰颁布《基础教育国家核心课程》。2006年欧盟通过《针对终身学习的关键能力：欧洲参考框架》。2008年澳大利亚发布《墨尔本宣言》。2010年新加坡教育部颁布了新加坡学生的“21世纪素养”框架。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报告《走向全球化的学习：每位儿童应当学什么》。这些文件都反映了建构学生核心素养模式的共同追求。

2014年3月30日，我国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研究制定“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并指出核心素养的内涵，即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要求体系应“突出强调个人修养、社会关爱、家国情怀，更加注重自主发展、合作参与、创新实践”。

2016年2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征求意见稿）》发布。2016年9月13日，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以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为基本原则，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具体细化为国家认同等18个基本要点。

据了解，正在修订中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将“坚持立德树人，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推进语文课程更深层次的改革，着力提高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响应时代的召唤，加强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遵循时代性、基础性与选择性的统一，构建开放、有序的语文课程”列为课程的基本理念。

根据语文课程标准的表述，“语文素养”是学生在积极的语言实践活动中积累与构建起来，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来的语言文字运用方式及其品质；是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获得的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思维方法和思维品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综合体现。“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是指语文素养的核心要素和关键内容，主要包括“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方面。其中，“语言建构与运用”是根基，是“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实现的途径。“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应当在“语言建构与运用”的过程中达成。^[12]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出，意味着课程观的转变：课程即问题。课程不是教科书传递的知识，而是不断被探究、理解的问题。江苏特级教师宋运来执教《鞋匠的儿子》，不满足于对教科书提供的文本解读，而且找来六种版本的《林肯传》进行研读。他发现课文的主人公林肯竟不是鞋匠的儿子，而是木匠的儿子。据此重构教材、超越教材，并撰写了教研论文《教材的批判与教学的超越——从〈鞋匠的儿子〉公开课谈起》。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出，也意味着教学观的转变：教学即研究。教学不仅是教师教学生学，更重要的是教师与学生研究，可以是教师与学生合作研究，也可以是教师帮助学生研究。著名特级教师贾志敏2016年11月在河南郑州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小学魅力课堂教学大赛暨第四届“名师大课堂”观摩会上执教《推敲》时，即引导学生对教学文本进行研究。对“唐朝有个诗人叫贾岛，早年因家境贫寒，出家当了和尚”“这时，正地京城做官的韩愈，在仪仗队的簇拥下迎面而来”两句中的“早年”“仪仗队”两词是否妥当进行推敲。他还在黑板上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最喜欢的老鸭汤搬上来了，妈妈扯下两条腿，一条放在我的碗里，另一条放在奶奶的碗里。”引导学生找出并修改这段话存在的七处毛病。

如果说2001年启动的新课程改革是从“双基”走向“三维目标”，那么，当今的教育改革则是从“三维目标”走向“核心素养”。语文

“双基”主要是从语文学科的视角来刻画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容和要求。语文“核心素养”则是从未来人的视角来界定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容和要求。从语文“双基”到“三维目标”，再到语文“核心素养”，其变迁基本上体现了从学科本位到以人为本的转变，从教书走向育人的转变，落实了“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适应了教育改革的时代和国际潮流。

参考文献：

- [1]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56.
- [2] 辛安亭. 我与语文教学：三十多年来我在中小学语文教学方面的主要意见 [J]. 西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4）：87.
- [3] 课程教材研究所. 20 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课程（教学）计划卷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4] 叶圣陶.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725.
- [5] 叶圣陶. 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 [J]. 中国语文，1978（2）：115.
- [6] 刘国正. 语文教学在前进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57-173.
- [7] 魏书生. 研究学生心理 提高语文教学效率 [J]. 语文教学通讯，1984（1）：49-50.
- [8] 顾黄初，钱梦龙，徐振维，等.《九年义务教育大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能力训练指要 [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278.
-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
- [11] 林崇德. 对未来基础教育的几点思考 [J]. 课程·教材·教法，2016（3）：3.
- [12] 徐林祥，郑昀. 基于语文核心素养的“语用热”再认识 [J]. 全球教育展望，2016（8）.

（责任编辑：周国华）

From “Double Base” to “Three-Dimensional Target”, to “Key Competency”

——A Review of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Chinese Subje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China

Zheng Yun, Xu Linxiang

(Colleg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angzhou University, JiangSu Yangzhou 225002, China)

Abstract: The “double base”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basic knowledge of Chinese teaching and basic skills training, but it may lead to the tendency that knowledge indoctrination, purely technical training, neglect of education in emotional attitudes and values. Three-dimensional goal focus o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people, and it expect the students master the method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acquiring knowledge, fostering ability, shaping emotional values and promoting students’ overall competency. But in practice three-dimensional goal splits the whole goal into three types of goals or three goals, and they emphasis emotional attitudes and values too much. Key competency of the Chinese subject means the changes of the curriculum view and the teaching view: the curriculum is the problem, the teaching is the research. It fulfilled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the “Morality Education”, and conformed to the time and international trend of the education reform.

Key words: Chinese curriculum; double base; three-dimensional target; key competency